

「與保皇派大戰」

一、同盟會成立前的早期論戰

革命運動的前進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民主革命日益向前發展的這一時期，即同盟會成立前後的中國民革命準備時期，在拯救國家危亡問題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救國道路：一種是孫中山所代表的民主革命道路，一種是康有為、梁啟超所代表的改良主義道路。孫中山從革命民主派的立場出發，宣傳科學進化論思想，主張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康有為和梁啟超則恰恰相反。他們從改良派的立場出發，宣揚庸俗進化論思想，反對民主革命，主張在保存清朝封建統治的基礎上實行君主立憲，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來發



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 保皇派代表人物康有為。

展資本主義。這種主張，實質上是使中國人民繼續沉淪在半殖民地和封建社會的苦難深淵中，以適應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需要。

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保皇派，原是十九世紀末期的維新派。變法失敗以後，在二十世紀初，他們仍念念不忘他們的「聖主」，站在歷史潮流的對立面，堅持改良主義道路，維護賣國的清王朝，反對暴力革命，日益成為民主革命潮流沖刷的對象。他們認為只要「勸告」清廷改良政治，「要求」清廷實行立憲，就可以挽救中國，所以主張在保存清朝封建統治的基礎上做枝枝節節的改良。

早在一八九九年七月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就分別在加拿大、日本和南洋等地，在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中組織「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保皇會，以擁戴光緒皇帝反對慈禧太后、鼓吹君主立憲制度為宗旨，拼命活動，搶奪興中會的陣地和群眾。他們為貫徹其反對革命主張，編制種種謊言，混淆是非，甚至不擇手段地招搖撞騙以擴大其影響，來抵制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梁啟超曾一度偽裝願與孫中山合作，向孫中山保證「合作到底，至死不渝」，騙取了孫中山給孫眉等興中會會員的介紹信，持赴興中會的發源地——檀香山活動。他還用詭辯把君主立憲的反動主張塗飾起來，說什麼「名為保皇，實則革命」，⁶⁵以假亂真，欺騙蠱惑群眾。其實梁啟超在給康有為信中就曾經說過：「與革命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

則無彼。」⁶⁶他先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鼓吹「斥後保皇」；後又主編《新民叢報》（半月刊），作為保皇會開展反革命「死戰」的喉舌。

當時，在國內外知識界和華僑中，曾有許多人被改良派所迷惑，在思想上分不清改良與革命的界限。就是興中會中也有不少會員（包括孫眉在內）受到欺騙，檀島的會員竟被保皇會奪去大半，海外其他各埠興中會會員也有很多被拉進保皇會為康、梁所利用。到了一九〇三年，保皇會在海外的勢力極為膨脹，僅在美洲各埠就設立了十一個總部和八十六個支會。保皇會人在華僑中間竭力打擊革命力量，鼓吹君主立憲主張，還借救國之名，招搖撞騙，詐騙錢財，謀取私利。而興中會的組織被破壞得零落不堪，已經是今非昔比。在這種情況下，保皇派已成為革命前進道路上的第一大攔路虎，如果不對其給予迎頭痛擊，在政治上、思想上揭穿他們的反動面目，革命就不可能向前發展。

一九〇〇年以前，孫中山為擴大革命力量，曾經爭取改良派，準備和他們合作。沒想到改良派「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⁶⁷他在國內外革命形勢推動之下，逐漸從保皇會陰謀奪取陣地、奪取群眾的活動中，進一步看清了改良派的面目，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認識到必須嚴格劃清革命與改良的界限。為了掃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發展革命力量，孫中山從一九〇〇年以後就針對康、梁掀起的保皇逆流，逐步展開了不調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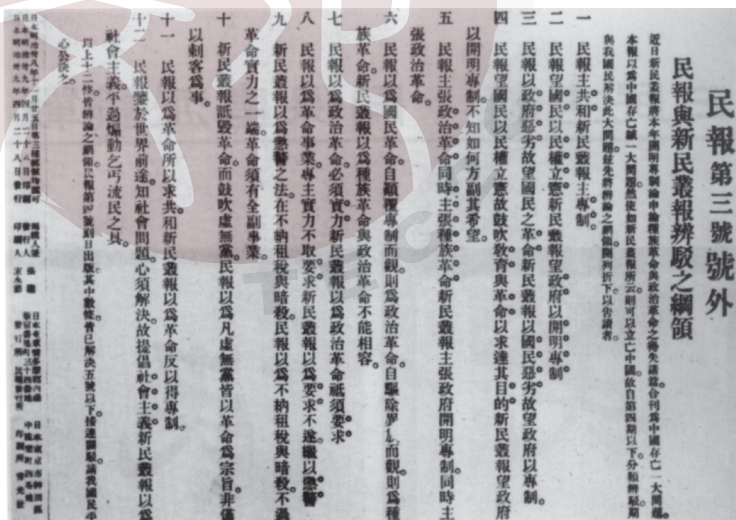
66 《致蔣觀雲、徐佛蘇書》，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四冊，油印線裝本，第三百六十頁。

67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百七十三頁。

的鬥爭。他是高舉民主革命的旗幟與改良派進行堅決鬥爭的第一人。

早在一九〇〇年，孫中山對梁啟超上年在檀島招搖撞騙的無恥行徑已給以嚴厲的譴責；隨後，在孫中山的指導下，橫濱的革命派半月刊《開智錄》、香港革命派機關報《中國日報》對保皇派一些報刊（如《清議報》、《商報》（香港）、《嶺南報》（廣州）以及後創的《新民叢報》等）上的反動謬論，都進行批駁。

兩派之間初步進行了理論上的交鋒。當時，孫中山認識到，要想喚醒群眾，不被康、梁所迷惑，必須大力創立宣傳機關。於是，他先後指派幹部陳少白、秦力山、沈翔雲、陳天華、劉成禺等在香港、檀香山、舊金山、日本、新加坡、緬甸等地創辦、改組或支持《國民報》、《檀山新報》（原為華僑程蔚南辦的商業報紙，俗名《隆記報》）、《大同日報》（原是致公堂的機關報，曾被保皇會人篡奪），以及後來的



《民報》第三號號外刊登的革命派同保皇派論戰的提綱。

《民報》、《中興日報》、《光華日報》等多種中文報刊，⁶⁸積極開展革命宣傳，號召人民從思想上、組織上同改良派劃清界限。同時，他還號召國內外各地革命派的組織，也廣為創辦報刊，共同對改良派進行鬥爭，「竭力打擊保皇毒焰於各地」。

一九〇三年夏，孫中山在日本先向應聘赴檀香山任教職的興中會會員、基督教會牧師毛文明佈置了兩項任務：「（一）掃除保皇邪說；（二）規復革命機關」；⁶⁹然後，他親自赴檀香山領導對改良派的論戰。孫中山認為「非將此毒剷除（按：指肅清梁啟超等人欺騙

68 孫中山非常重视宣傳工作，他在辛亥革命前於海外創辦、改組或支持的中文報刊，據不完全统计，主要的有十三種之多。這些報刊創刊的時間和地點是：一八九九年香港的《中國日報》；一九〇一年日本的《國民報》；一九〇二年檀香山的《檀山新報》；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民報》；一九〇七年加拿大的《大漢公報》、暹羅（今泰國）的《華暹新報》和新加坡的《中興日報》；一九〇八年緬甸的《光華日報》；一九一〇年美國的《大同日報》和《少年中國晨報》、加拿大《新民國報》和馬來亞（今馬來西亞）的《光華日報》；一九一一年菲律賓的《公理報》。

69 毛文明：《紀癸卯總理重至檀香山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五冊，臺北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十八頁。



為擴大革命宣傳陣地，孫中山將華僑程蔚南創辦的《檀山新報》改組為興中會機關報。圖為該報報頭及一九〇四年十月孫中山發表的《駁保皇報》一文。

宣傳的流毒），斷不能做事」，他「決心盡力掃除此毒，以一民心」。⁷⁰為擴大革命宣傳和廣泛聯絡同志，孫中山應毛文明等所請，前往奧華湖（Oranienburg）島的希爐（Hilf），假該城日本戲院公開發表演講，批判保皇，宣傳革命，聽眾達千餘人。跟著，又在火奴魯魯的各大戲院中多次舉行大規模的公開演講，每次往往一連兩三天，聽眾常常超過千人。

在這些演講中，孫中山揭露了改良派的欺騙手法，批判了他們散佈的謬論，宣傳了革命道理。十二月十三日在荷梯里街戲院的演說中指出：「革命為惟一法門，可以拯救中國出於國際交涉之現時危慘地位」，「我們必要傾覆滿洲政府，建立民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⁷¹通過辛勤地宣傳活動，使許多華僑開始瞭解革命與保皇的歧異，誤入保皇會者紛紛退出。孫中山在一九〇四年一月給朋友的信中敘述同改良派鬥爭所取得的成績說：檀香山「四大島中已肅清其二，餘二島想不日可以就成功」。⁷²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和一九〇四年一月，孫中山針對保皇黨徒對革命的攻擊及散佈的謬論，在檀香山《檀山新報》上先後發表《敬告同鄉書》和《駁保皇報》兩篇重要文章，對改良派的「保皇」宣傳，作了猛烈的抨擊。他和梁啟超私人感情過去很好，但他嚴格劃清思想界限。

70 《致黃宗仰（烏目山僧）函》，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函札」，成都近芬書屋一九四四年版，第二十二頁。

71 檀香山英文《早報》（Advertiser）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轉引自《檀山華僑》「檀山華僑」部分，檀香山自由新報社一九二九年版，第十四頁。

72 《致黃宗仰（烏目山僧）函》，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函札」，成都近芬書屋一九四四年版，第二十二頁。

他說：我和梁啟超「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敵國。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強。總之，劃清界限，不使混淆」。這說明孫中山對待政治生活堅持原則的嚴肅態度。改良派把自己打扮成「愛國者」，硬說在民族危機深重的當時，被統治的各族人民和滿洲貴族集團統治者之間的利害是一致的，根本否認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他們認為如果進行革命反對清朝，就是破壞國內的「團結」，還要引起「下層社會」暴亂，破壞社會秩序，也就不可能抵抗外國的干涉和侵略，結果就會招致帝國主義瓜分而亡國。針對這樣一派胡言，孫中山尖銳地責問，改良派的所謂「愛國」，是愛虐民媚外的「大清國」呢，還是「中華國」？指出他們的「保皇」、「保滿洲政府」，絕不是愛國行為。並指出，清朝的統治是中國不能抵抗外國侵略者的首要因素。清朝政府腐敗無能，是「寧贈友邦，勿與家奴」的賣國政府。它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無力抵抗或者不抵抗，才使中國陷於被瓜分的危險境地。



1903年，香港《中國日報》連載黃世仲的《辯康有為政見書》，又刊登章太炎撰寫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有力地批駁了康有為的保皇思想。圖為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局部）。

絕不能互相混淆；號召僑胞「大倡革命，毋惑保皇」。他尖銳地指出，保皇派所謂「借名（保皇）以行革命」，所講的「革命」是假革命。他痛斥了保皇派替清朝政府辯護，反對暴力革命的荒謬論調，堅決主張進行推翻清朝政府的民主革命鬥爭。不少受過騙的僑胞讀了他的文章後，耳目為之一新，重新集合在革命旗幟之下。檀香山又成了革命黨人在海外的一個重要的據點。

一九〇四年春，孫中山在檀香山擊敗保皇派後，於四月六日專程到了舊金山。那裡風氣閉塞，沒有接受過多少革命的影響，又是保皇派勢力的集中地，華僑中的上層人物多受「保皇」宣傳之騙。在旅美華僑中十之八九都參加了洪門，還有為數不少的基督教徒。孫中山為了使宣傳易於生效，便先利用教徒和洪門的身分，對基督教徒和致公堂職員宣傳革命，邀集教友們召開救國會會議，提高他們的認識；隨後又在小商人及工人（大部分為洗衣工人、園丁和其他勞動者）中進行活動，發表公開演講，力駁「保皇」謬說，博得了人們日益廣泛的同情。他還在舊金山及其附近城市的一些戲院中，演說「愛國要義」，鼓吹革命排滿。當時，孫中山幾乎無日不在和改良派「苦戰之中」，「以圖掃滅在美國之保黨」。⁷³

美洲致公堂是以美洲華僑勞動者為主體，總部設在舊金山，並在紐約、芝加哥、波士頓等百數十埠設有分堂，在華僑中的勢力很大。但是，它的組織渙散，主張分歧，總堂、分堂，

73

《覆黃宗仰述在美掃滅保皇黨情形函》（一九〇四年六月十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三冊，臺灣一九九三年版，第三十二頁。

各自為政，不可能進行一致的行動。孫中山兩度遊美，發現洪門人士多已忘卻反清的革命宗旨，總堂職員除少數熱心人士外，多半泥守舊習。又經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會的歪曲宣傳，洪門成員特別是各堂職員多為所愚，兼充保皇會職員，並延聘保皇會分子主辦報紙，反清思想漸就泯滅。但在國內革命形勢和美帝國主義迫害華工的刺激下，下層華僑仍有革命要求。因此，孫中山認為聯絡洪門組織是當務之急，「先行設法聯絡各地洪家，成為一氣，然後可以再圖其他」。⁷⁴於是，他很快同舊金山致公堂大佬黃三德、書記唐瓊昌等結為好友，使他們成為反清革命的擁護者，從而推動致公堂的改革。

當時，孫中山向總堂建議舉行全美洪門會員總註冊（即重新舉行登記），並表示願親往各地對洪門會進行革命宣傳。這主張得到黃三德和總堂各職員的贊同。他還親為美洲致公堂重訂新章程，在新章程中強烈譴責清政府的黑暗統治和保皇會的反動立場，並明文規定「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⁷⁵接著，便於五月二十四日偕同黃三德從舊金山出發，赴美國各地對洪門會眾進行註冊和宣傳活動。所到之處，黃三德必「開台演戲」，孫中山則發表演說，闡揚反清革命宗旨，駁斥保皇謬論；並且，在各個地方「俱稱得手」，和改良派鬥爭方面取得一些成效。他們奔走數月，訪問了幾十個城市，在華僑中間廣泛進行革命宣傳。這一行動，對削弱保皇會在美國華僑中的影響，促使華僑傾向反清革命，起

74 《致黃宗仰（烏目山僧）函》，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函札」，成都近芬書屋一九四四年版，第二十三頁。

75 《致公堂重新章要義》，《民報》第一號。

了頗大的作用。

特別是一九〇五年八月孫中山在東京的講演中，針對改良派散佈的反對革命的謬論，給予了尖銳的、深刻的批駁。改良派叫嚷什麼革命只是破壞，有害無益。孫中山說，革命不僅是破壞，而且是建設；正是為了建設才進行破壞。改良派胡說什麼西方國家都是「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這是「進化的次序」，「斷難躐等」。孫中山指出了這個「斷難躐等」的論點是愚蠢、可笑的。譬如說，中國過去向來沒有火車，按改良派的「次序」，難道初用火車，必先用英、美幾十年前的「舊物」，然後才可以逐漸換用新式火車嗎？他認為應該取法乎上，向外國學習最進步的東西，嚴正駁斥了康、梁的在目前「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的庸俗進化觀點。他說：「而且世界上各國的立憲，也必須從流血中得來的才算是真正的立憲。同一的流血，我們為什麼不從事於直截了當的共和立憲，而從事於這不完不備的君主立憲呢！」對改良派仿照殖民主義者的口吻，誣衊中國人「惡劣」、「愚蠢」，沒有做共和國民的資格，中國不配實行民主共和制度，「程度不夠」，連君主立憲也不能立刻實行的無恥譏言，孫中山予以嚴正的呵斥，指出這是對中國人民的極大侮辱。他高度讚揚中國人民的智慧和能力，認為只要敢於革命，就一定能出現一個飛躍發展的局面。他號召大家摒棄改良主義道路，不惜流血，從「最上之改革（按：指進行革命）著手」，在封建皇朝的廢墟上建立一個「頭等民主大共和國」。

孫中山在抨擊那種認為只能跟在外國人後邊一步步爬行，不能「躐等」的謬論的同時，

還提出了一個光輝的預言：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史，有廣大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只要「發憤自雄」，「易舊為新」，推翻清朝政府，就一定能夠打破常規，以「異常之速度」前進；在數十年內不僅「舉西方之文明而盡有之」，而且勝過他們也是可能的。孫中山並認為，有志革命的人絕不能「無所藉手，磋跎歲月，寸功不展」，而應當「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不然那就「可羞之極」。

「斷難躡等」論，是改良派反對革命的一種詭辯。如果照著去做，中國就永遠處於落後的狀態，永遠也不能成為世界上的先進國家。孫中山敢於對當時看來頗為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挑戰，提出了超過西方的豪言壯語，痛斥了那種認為只能跟在外國人後邊一步步爬行的謬說，這種無所畏懼的精神和膽略，是值得讚揚的。

孫中山親自主持輿論宣傳，通過他的這些講演和文章，有力地揭穿了改良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幫助許多僑胞逐步瞭解到革命與保皇的區別；促使誤入保皇會的人覺醒，他們紛紛登報與保皇會脫離關係，重新回到革命派立場上來。其中，南洋華僑資本家邱菽園覺醒後，進一步揭發了保皇會的黑幕；華僑鄭螺生、李源水等還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組織。

孫中山與改良派經過激烈的論戰，終於奪回了革命派在日本、檀島等地華僑中間的陣地，初步打擊了保皇派的囂張氣焰，在政治上、思想上擴大了革命派的影響，為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創造了更好條件，並為中國同盟會的建立做了精神準備。

二、一九〇五年後的大論戰

在同盟會成立之後，孫中山更加意氣風發地領導革命派，對瘋狂反對革命的保皇會進行更廣泛、更全面的鬥爭，把論戰引向新的高潮，展開了和保皇會改良主義思想的大論戰。

經過同盟會成立前一個階段的初步辯論，保皇會的改良主義思想曾受到一次衝擊，他們的囂張氣焰也遭到一定的打擊；但是，在海內外思想、輿論界和一些群眾中，改良派仍然有著相當大的影響。並且，當時康、梁的保皇派依然沒有停止他們反對革命的活動。一九〇六年夏，「保皇黨」籌備改組政黨，將組織定名為「帝國憲政會」。梁啟超聲言：「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命黨死戰，乃是第一義。」⁷⁶他在其機關報《新民叢報》對孫中山提出的「民生主義」大肆攻擊。翌年十月，

梁啟超等在東京又成立「政聞社」，全力配合清政府的「預備立憲」活動。之後，「保皇黨」機關報《南洋總彙報》記者以「平實」的筆名，連續發表《論革命不可強為主張》等文，提出革命不能行於今日，以及革命足以瓜分中國的胡說，肆意攻擊革命黨。

為了民主革命的勝利開展，必須徹底掃清思想上的這一障礙。因此，孫中山直接領導下的《民報》，從創刊號開始，在大力宣傳同盟會的政綱的同時，就對保皇黨進行猛烈、系統的

批判。這一批判，主要是通過與改良派的宣傳工具《新民叢報》開展論戰實現的。

一九〇六年四月《民報》第三號發行號外，列舉《民報》和《新民叢報》根本分歧的十二個問題，聲明自第四號以下，分類辯駁。革命派有組織、有計劃地同改良派的大論戰劇烈展開了。

《民報》是論戰的主要陣地，同時散佈在海內外各地的革命報刊，如南洋的《中興日報》、檀香山的《自由新報》、曼谷的《華暹新報》、仰光的《光華報》、溫哥華的《大漢公報》等，也紛紛投入戰鬥，同當地改良派的喉舌《南洋總彙報》、《新中國報》、《啟南新報》、《商務報》、《日新報》等，展開針鋒相對的激烈論戰。捲入論戰的報刊共達數十種。論戰的主要地點為上海、廣州、香港以及國外的東京、橫濱、檀香山、舊金山和新加坡等城市。論戰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鬥爭之激烈，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少見的，形成了思想戰線上的一次大辯論。

孫中山在這段期間所寫的《〈民報〉發刊詞》和演講，全面地闡釋了三民主義，有力地駁斥了改良派



同盟會時期革命黨人在海內外發行的革命報紙。

對同盟會及其綱領的污蔑和攻擊，成為革命派與改良派鬥爭的犀利武器。在《民報》上刊載的重要論戰文章，不少是出自孫中山口授，或根據其授意撰寫的。例如《革命不致召瓜分說》一文，就是孫中山口授而由汪精衛執筆寫成的。⁷⁷

這些文章，列舉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清朝政府投降賣國、殘虐人民的罪行，指出清王朝是中國貧窮落後不能獨立的根源，只有用革命辦法推翻這一「野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的國家，才能避免瓜分，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而改良派死心塌地為清王朝的反動統治辯護，正說明他們所說的愛國是假的，真正愛的是虐民媚外的清政府。

孫中山在旅居日本期間，一直堅持不懈地對改良派的謬論進行駁斥。他對一九〇七年一月梁啟超托人找宋教仁疏通，提出《民報》與《新民叢報》雙方「以後和平發言，不互相攻擊」的求和要求，堅決反對，不同意章太炎「可以許其調和」的錯誤主張，堅持把論戰進行到底，及時制止了同盟會內部的妥協傾向。⁷⁸



一九〇七年的孫中山。

77 《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輯，臺灣一九五五年版，總第三百八十九頁。

78 宋教仁：《我之歷史》第六冊，湖南桃源三育乙種校一九二〇年石印本，第三頁。

同年三月初，孫中山被日本政府迫令出境，轉赴南洋活動。次年十月，《民報》又被日本政府無理封禁。於是，革命派和保皇會的重要骨幹陸續南移，南洋成了兩派激烈爭奪的重要地盤。一九〇八年夏季以後，新加坡保皇會利用同盟會在軍事上遭到嚴重挫折之機，通過《南洋總彙報》加緊了對革命黨人的攻擊，兩派的論戰日趨激烈。孫中山親自領導了這一批判改良派的鬥爭，他提出以「攻心為先，以至理服人」的指導方針，並組織同盟會重要骨幹黃興、胡漢民、田桐、林時壘、汪精衛等人先後到該地參加論戰，撰文批判保皇派。

當時，孫中山曾口授胡漢民等編印有關立憲和外交等問題的小冊子，散發各地，力批保皇謬說。他還在九、十月間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親自撰寫了《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平實尚不肯認錯》、《平實開口便錯》三篇論戰文章，以「南洋小學生」為筆名，在《中興日報》上連續發表，逐一批駁、抨擊了保皇會宣揚中國革命會招致瓜分等的謬論。

孫中山在《平實開口便錯》的文章中指出，從南洋到內地，革命思想一天比一天高漲，革命者的責任就是要挺身而出，「喚起同胞，使之速醒，而造成革命之形勢」⁷⁹。

通過論戰，闡明了民主革命的主張，澄清了被歪曲了的事實，使保皇派理屈詞窮，也不得不承認「革命黨理長、保皇黨理短」。影響所及，南洋各埠革命派報紙紛紛投入了批判保皇派的鬥爭。這場論戰，挫敗了南洋的保皇勢力，擴大了革命派的陣地，增強了革命黨人的決

心和勇氣，促進了華僑的革命覺醒，對當時的鬥爭起了直接的配合和支援作用。

一九〇九年後，孫中山又轉往美洲。美洲是康有為等經營多年的一塊基地。孫中山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仍然孜孜不倦地宣傳革命主張，揭露保皇會。經過他的努力，促使華僑紛紛登報脫離保皇會，轉向了革命。

在孫中山指導下，革命派在許多宣傳陣地上大張旗鼓地同改良派進行了論戰。其中，表現比較突出的，是孫中山的革命戰友、民主革命派傑出的活動家和理論家朱執信。他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八年，在《民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政論文章，以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為綱，駁斥改良派的反革命謬論。在《論滿洲欲立憲而不能》、《駁「法律新聞」之論清廷立憲》、《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心理的國家主義》等文中，他從當時存在的國內民族矛盾現狀出發，論證了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當「以一役而悉畢其功」，分析了社會革命的主力 and 物件，以及其形成的原因，抨擊了清朝政府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反動政策，說明這個政府就是「內憂外患」的禍根；揭露了清朝政府假立憲的騙局，把康、梁之流所散佈的種種謬論斥之為欺騙人民的謊言，指出清朝統治者不可能進行任何真正的改革。他極力主張用革命辦法去求得共和的實現，反對改良主義的調和論，號召人們摒棄對清朝政府的幻想，舉起反清的旗幟，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而鬥爭。

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這場論戰的內容，涉及的範圍很廣，歸納起來，主要是環繞三個方面：是「保皇」還是革命？是維護清政府，行君主立憲，還是推倒它，新創民主共和國？

是維護還是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在這一系列的問題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針鋒相對的。革命派對問題的回答是明確的，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就是具體答案。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孫中山在東京神田錦輝館舉行的《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了系統闡述三民主義思想的演說。他對三民主義政治綱領作了一個總的概括：「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制，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制，故要社會革命。」⁸⁰這就是說，堅決主張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並且在政治革命勝利以後，進行改造封建社會經濟制度的「社會革命」。而改良派對問題的回答卻截然相反。他們千方百計為清王朝注射「強心劑」，妄圖用改良主義的方法實行君主立憲，並且極力反對任何「社會革命」。

現將論戰的三個方面內容概述如下：

(一) 在「保皇」還是革命的問題上，改良派由於否認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認推翻滿清政府的必要。他們從維護清朝封建政權的立場出發，大肆宣揚「忠君保皇」，極力鼓吹光緒皇帝的「聖德」，並胡說清政府經過「外患刺激」已經覺悟，確有決心實行立憲以求變法圖強。提出若要革命就會使人們陷入一場「殺人流血之慘」的災禍，就會引起瓜分和內亂，必然要導致亡國。在論戰中，革命派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從各方面深刻揭露了

清朝政府所實行的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以及投降外國侵略者和暴虐殘害人民的罪行，並揭露了清政府玩弄假立憲以圖苟延殘喘的卑劣陰謀。進而指出：革命有百利而無一害，它的目的在於推翻君主專制的黑暗統治，摧毀一切「陋俗弊政」，以建設新的國家，新的社會，根本不是什麼「殺人流血」。至於中國所以面臨被瓜分的危機，是同清政府的腐朽和媚外賣國政策分不開的；清朝專制政府的存在，是中國不能獨立，遭到瓜分的重要原因。認為一日不推翻賣國的清朝政府，瓜分的危機就一日不能解除。只有推翻清朝專制政府，建立民主政治，才能把中國從危亡中挽救出來。

(二) 在行君主立憲還是新創民主政體問題上，改良派認為中國萬萬不能建立共和政體。他們為了維護清王朝統治和反對革命，誣衊中國人「民智不逮」，實行民主必將引起混亂，只能實行君主立憲，胡說君主立憲是民主共和的必然階段。革命派堅決駁斥了這種荒謬論調。他們認為在進行「種族革命」的同時，還必須進行「政治革命」，這就是要徹底改造幾千年來君主專制之政府，建立實行民權立憲制度的共和政體。他們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一天賦人權」學說作為依據，認為「民權」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中國人民只有也必將在革命鬥爭和民主政治的實踐中、學會行使自己應該享有的權利。並有力地指出，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並不下於世界各民族；通過流血革命由君主專制變為民主共和，也是「進化之公理」。據此，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不但有資格，有才力，而且是適應「進化之公理」。他們果斷地說：為了革除封建專制的弊病，這次革命不只是打倒皇帝改朝換代，更重要的是

要建立民族的國家、民主立憲政體和實行民生主義。

(三) 在維護還是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上，兩派就不能實行以民生主義為內容的「社會革命」進行辯駁。改良派完全否認中國有實行「社會革命」的必要。他們胡說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是完美無缺、不可侵犯的，如果鼓吹「社會革命」，觸動封建土地制度，就會危害「國本」。並謾罵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主張是為乞丐、流氓著想，若實行這種革命就會引起「下等社會」的騷動，就會破壞社會秩序，就會亡國。革命派嚴厲駁斥了改良派的謬論和種種污蔑。他們指出：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弊病百出，使土地壟斷在少數人手裡，「全國困窮，而資本富厚悉歸於地主」。「社會革命」之所以出現，不是出於人們的主觀意願，而是起因於「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完全」。並指出「平均地權」是為了實現革命的平等社會，不是破壞社會秩序；認為應趁中國資本主義大生產還沒有發達以前，用「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政策來防止發生貧富過分懸殊的問題。

以上三方面問題的論戰，歸根結底是要不要實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政治路線，即要不要武裝推翻清王朝建立立資產



辛亥革命前革命運動形勢圖。

階級共和國。在這場論戰中，儘管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還有自己理論上的弱點，但他們堅決反對媚外賣國、腐朽透頂的清朝政府，反對君主立憲，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在《民報》上逐期發表論文，宣傳民主革命的道理，介紹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進步學說，駁斥了改良派的反革命謬論，揭穿了改良派的反動嘴臉。這一宣傳鼓動工作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民報》在它的宣傳中，在駁斥改良派謬論的同時，把同盟會的綱領更加具體化地傳播到全國各地。一些同盟會員和革命知識分子編寫的革命宣傳品，流傳到各地的學校和清政府編練的新軍⁸¹內部，學生和士兵爭相傳誦，成為秘寶，大大促進了人民的覺醒。革命思想在群眾中「一唱百和，如飲狂泉」，它的傳播有一日千里之勢，形成了「以不談革命為恥」的風氣。許多進步青年，爭先恐後地湧向革命隊伍。據孫中山記述，同盟會成立不期年而加盟者就超過了萬人。

孫中山在這一時期，又不辭辛苦地到處奔走，在揭露保皇會，宣傳和捍衛民主革命思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親自作講演，寫文章，通過各種方式「打擊保皇毒焰」，宣傳中國必須革命的道理。他贏得的聲譽越來越高，團結在他周圍的革命志士越來越多，支持他的人越來越廣泛，形成「孫文演說，環聽輒以數千，革命黨報發行購閱，數逾數萬……入會之人，

81 新軍是清政府為加強鎮壓人民，用資本主義國家練兵方法訓練出來的一支軍隊，用的是新式武器，他們中有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

「日以百計」⁸²的極為興盛的景象。

而改良派的勢力則一落千丈，被人們唾罵。革命形勢蓬勃發展，使得改良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失敗，他們驚呼：「近幾年來，中國到處都在談論革命，現在又得到政治上、法理上的闡發、贊助，它的旗幟更鮮明，它的壁壘更森嚴，它的勢力越加磅 而壯大，連販夫走卒，都談論革命，甚至真正行動起來了。」⁸³作為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手，孫中山領導革命派對改良派進行的這一場大論戰，前後持續了數年之久。這場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論戰，是中國革命派同保皇派的政治大搏鬥。論戰的實質是革命還是保皇的兩條救國道路的問題。

在這一論戰中，孫中山指導《民報》與其他革命報刊一起痛斥保皇派的謬論的同時，並撰寫了許多文章，批駁保皇派害怕民眾、害怕革命、害怕列強瓜分的錯誤觀點。他再三強調，只有採用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政治制度，由先進分子去領導民眾，才能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平等、繁榮、富強的新中國。在辯論中，孫中山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論和策略，提出了革命的次序，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使國民循序漸進，養成自由平等的資格。同時，提出將來的憲法，在西方行政權、立法權、裁判權（司法權）三權分立的基礎上，增加考試權、糾察權，構成五權憲法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大法。

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派，在這場激烈的論戰中鬥志昂揚，意氣風發，表現了朝氣蓬勃

82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四十一頁。

83 與之：《論中國現在之黨派及將來之政黨》，《新民叢報》第九十二期。

的革命精神。他們剝開了改良派充當清朝走狗的畫皮，駁斥了其反對革命的謬論，並清除掉改良派的反動影響，捍衛並發展了民主革命綱領，奪取了思想戰線上的領導權。於是，革命民主主義得到廣泛傳播，影響日益擴大，有力地推動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來，從而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和輿論準備。後來，毛澤東曾高度讚揚孫中山「在中國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以鮮明的中國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國改良派作了尖銳的鬥爭。他在這一場鬥爭中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⁸⁴綜上所述，革命派與立憲派之間的這場大論戰，從根本上說，是資產階級兩個政治派別在如何改造中國問題上的爭論。它不是要做什麼的目的之爭，而是應該怎麼做的方法、手段、道路之爭。立憲派的理論宣傳存在著嚴重的錯誤和缺陷，遭到革命派的嚴詞駁斥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們決不是維護清王朝反動統治的反動派，更沒有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結成政治聯盟。他們雖然在一些根本性、全域性問題上的觀點是錯誤的，但並非所有的論據都是無的放矢、惡毒攻擊，其中包含著某些合理的成分，某些對時局發展的估計，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因此，在重視對革命派理論體系研究的同時，對立憲派理論體系的研究和分析，同樣是必要的。

從一定意義說，這次沒有硝煙的反對保皇黨的論戰，決定了中國的政治前途和命運。

當然，在這場論戰中，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革命派也明顯地暴露出自己的弱點，即在反

帝、反封建兩個根本問題上，依然缺乏革命的徹底性。這主要表現在：首先，他們不是把帝國主義看作是革命的最主要的敵人，卻極力向外國侵略者表白「排滿」決不是「排外」，力圖避免「刺激」帝國主義強盜，幻想帝國主義會同情革命、贊助革命，甚至企圖以讓步來換取這種同情和支持。其次，他們雖然駁斥了改良派指控「平均地權」的謬論，但「平均地權」遠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它並不能徹底動搖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最後，他們不是把勞動群眾看作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動力，反而害怕和要求限制勞動群眾的革命行動，強調必須把「文明排外與野蠻排外」、「秩序的革命」與「自然的暴動」加以區別，從而限制了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徹底進行。這些不徹底性，是歷史和時代條件的局限性使然，不宜苛求的。

通過這場大論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得到了發揚，同盟會的政治綱領得到廣泛傳播。可以說，同盟會正是在論戰中顯示了它作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政治威望，而孫中山的名字，也在大眾傳播媒介效應下獲得了國內外更多的知音。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說，這場大論戰無疑地促成了近代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為辛亥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礎。